

中国 古代 十大 散文 家 精品 全集

司马迁

精品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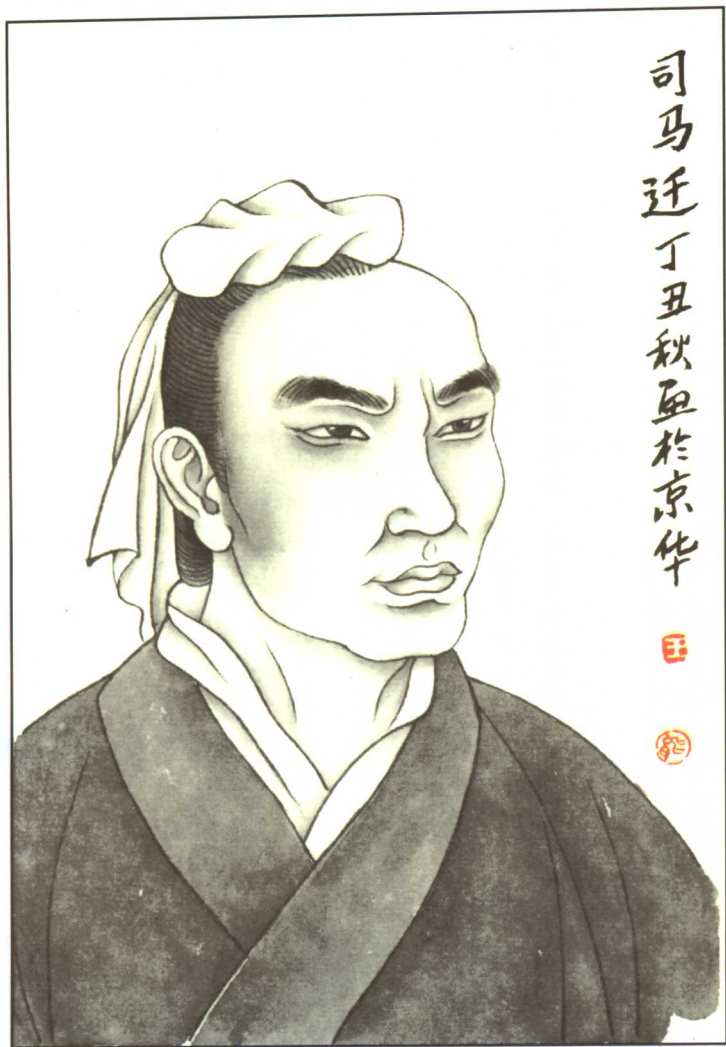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司马迁

●黄 涛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大连



司馬遷
丁丑秋
画於京华



司馬遷 像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主 编 郭预衡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任编辑 许文彦
装帧设计 羽 人
插图绘画 王国能

〈庄 周〉卷	张文瀚	选注
〈司马迁〉卷	黄 涛	选注
〈韩 愈〉卷	洪祖斌	选注
〈柳宗元〉卷	尹 江	选注
〈欧阳修〉卷	阿忠荣	选注
〈曾 巩〉卷	张廷银	选注
〈王安石〉卷	萧 放	选注
〈苏 轼〉卷	陶文鹏	选注
〈晁有光〉卷	齐石宜	选注
〈袁宏道〉卷	李真瑜	选注
〈集外卷〉卷	田南池	选注
	赵伯陶	选注
	李 鸣	选注
	韦凤娟	选注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散文创作而闻名的大家不少。其中可称祖师者，有先秦的庄周、汉代的司马迁；可称大家者，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唐宋以后，可同大家比肩者，有明代的归有光；可与大家抗衡者，有晚明的袁宏道。其作品或汪洋恣肆，或生动传神，或逻辑严密，或文采横溢，均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家散文创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11卷11册，选编了这十位散文家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先秦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散文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散文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散文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散文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散文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篇文章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作品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该散文家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创作简表”和“散文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该散文家的其他选本或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散文作品大多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庄周、司马迁和王安石以外，每个散文家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篇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作家们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司马迁的 生平与 散文创作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这首五言律诗出自当代文化巨匠郭沫若之手。郭沫若做为举世公认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和史学贡献的评价，自有独到的识见和深刻的体察，他用这首诗，向世人颂扬着这位不朽的文化名人，评述着司马迁悲壮的一生。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幼年在家乡度过一段牧耕生活后,随父亲司马谈迁至长安,向儒学大家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司马迁二十岁时开始漫游,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任职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受命主持制订“太初历”并着手撰写《史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其后事迹不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卒年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

有关司马迁生平活动的资料不多,有确考的更少,我们搜寻到与他的创作密切相关的资料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的熏陶。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祖先世为周王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具有广博的学识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而体现司马谈思想倾向最典型的资料是他的《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把春秋战国以来蜂起并作的百家之学,用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加以概括,全面肯定了道家学说,对其余五家则进行了批判,体现出他对先秦诸子的精深研究。这篇文章作于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敢于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公

开表明崇道抑儒，这种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做传以良好的启示，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虽然司马谈的思想倾向偏重于道家，但他对儒家并非不尊，他能博取诸家之长，把自己深厚的思想传于司马迁。他使司马迁十岁就能诵习“古文”，并让儿子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使司马迁具有兼取诸家之长的博大胸怀，极大地丰富了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为司马迁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父亲的遗嘱。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而做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却因病滞留于周南（今河南省洛阳一带），不得参与其事。他深感失望，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而此时，已做了郎中的司马迁正从西南地区出使归来，看望了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后，曾想效孔子的《春秋》而修一部史书，以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他未能如愿就要赍志以殁了。弥留之际，他郑重地嘱托司马迁“无忘吾所论著”，司马迁此时百感交集，泪流满面：“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后来，司马迁发愤著述，以致于为了父亲的遗愿而“隐忍苟活”。

第三、中青年时期的漫游。大自然是无

私的，它聚天地之灵气，育人间之秀美，司马迁就出生在富于神话色彩的龙门。龙门是一座名山，横跨黄河，两岸断山绝壁相对如门，黄河穿山而过，倾泻奔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诱发了人们对龙门的神奇遐想，也为司马迁幼小的心灵插上了神思的翅膀。司马迁在龙门度过幼年的牧耕生活后，便随父亲迁到长安读书。

司马迁二十岁时，开始了漫游生活，足迹所至，遍及长江中下游和今山东、河南的广大地区。在游历过程中，他饱览山川胜景，考察历史遗迹，采访各种传说和历史人物的遗闻佚事，了解各地的民俗风情和经济状况。这次漫游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为后来创作《五帝本纪》、《夏本纪》、《河渠书》、《孔子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屈原贾生列传》及秦汉之际的许多人物传记打下坚实的生活基础，而且也陶冶了他的生活情趣，磨炼了他适应生活的顽强意志。这次游历归来，司马迁开始步入仕途，“仕为郎中”，并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了解了西南地区的情况，对后来创作《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等大有裨益。司马迁出使归来，正值父亲病于周南。他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后，跟从武帝出巡，参加了封禅大典，考察了我国东部、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后来撰写《封禅书》《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等篇目创造了条件。后来，他又多次随武帝出巡，为撰写《史

记)搜集了大量资料。

第四、遭李陵之祸,发愤著述。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工作,“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金匱石室”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三、四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主持制订了《太初历》之后,便根据业已掌握的史料“论次其文”,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天汉二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李陵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司马迁根据自己平时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投降,是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会报答汉朝。当武帝召问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时,为了宽慰皇上,司马迁“即以此旨,推言陵功”,没想到他的“拳拳之忠”竟触怒了武帝,认为他“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被下狱治罪,司马迁因无钱赎罪,又没有人搭救他,于是受了宫刑。其实“推言陵功”只不过是武帝惩罚司马迁的一个借口,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写了《史记》。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古代良史秉笔直书的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

居然敢于“贬损当世”，极言先帝之短和“今上”之过，学术上又“崇黄老而薄五经”，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格格不入。显然，司马迁遭祸已是势所难免。

“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在“蚕室”中想到了死，但父亲的遗愿尚未完成，《史记》“草创未就”，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等先贤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的著作。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职位上虽然比太史令高，但这只是“闺阁之臣”，与宦官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把耻辱变为动力，更加集中精力写作《史记》，并在若干篇幅中流露出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史记》全书的类别及篇数，与今传《史记》相同，可见这时已基本完成了《史记》的创作。从此以后，司马迁的事迹无从确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上古时代，“史记”是史书的泛称，隋唐以后，“史记”一名才变为《太史公书》的专有名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叙了从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个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政迹，是全书叙

事的提纲；“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要大事记，是全书的联络和补充；“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史；“世家”主要记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则是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传记。这五种体例，以本纪为纲，互相配合，体制严密，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杰作。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但现在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激情的优秀散文。《悲士不遇赋》是司马迁晚年的咏怀之作，赋中揭露了“美恶难分”的黑暗现实，感叹自己“生不逢辰”，抒发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从赋中我们看到了一位饱经忧患、感慨深沉，而又坚持真理、不甘寂寞的倔强的老人形象。

二

司马迁英名远播，《史记》流传千古，不仅因为他在史学史上树起了“纪传体”的丰碑，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所描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表现出司马迁卓越的审美能力

和杰出的文学成就。

司马迁的作品，思想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以勇敢的求实精神对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对被奴役的下层民众则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众的力量及其反抗斗争的精神。丰厚的思想内容是靠独到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的，《史记》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为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些艺术形象，认识价值极高，并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司马迁写人物不是有闻必录，他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加以细腻的描述，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点。如《项羽本纪》，突出写项羽参加反秦斗争的八年历史，这八年之中，又突出写他的三件大事：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巨鹿之战写他叱咤风云，勇冠三军，摧毁秦军主力，成为反秦斗争中众望所归的人物；鸿门宴写他天真坦率，优柔不忍，以至于轻纵敌手，养虎贻患；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斩将刈旗、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单凭个人之勇终陷绝境，引剑自刎的悲惨结局。通过这三个场面，作品突出他勇武过人、直率磊落而又刚愎自用、不善智谋的性格特点。再如《魏公子列传》，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但作者却没

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的政治军事活动，而把描写重点放在欢迎侯生、窃符救赵的故事上，突出他的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点。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选取“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故事突出蔺相如智勇双全的特点。这是司马迁提炼历史题材，刻画人物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时一个人物所经历的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太多，作者就采用概述与特写相结合的办法。如西汉名将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而《李将军列传》在概述了李广为人用兵的全貌以后，只详细描写了三个具体的战斗场面，突出了他英勇善战的特点，点面结合，形象鲜明。

有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较多，人物性格复杂，往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全面介绍会影响人物性格的突出，略去一面，则又影响历史的真实。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司马迁巧妙地运用互见法来调节二者的关系，使之完整统一。互见法是将一人的事迹分散于各篇，以便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的描写方法。如《项羽本纪》集中笔墨突出项羽英勇善战，而他在政治、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以及他个性中残暴的一面，却分散于《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再如《魏公子列传》只字不提信陵君畏秦而不纳魏齐的虚饰情态以及侯嬴对这件事的批评，却在《范雎蔡泽列传》中补述出来。司

马迁在写汉代帝王时，更是“本传”中有所忌讳，而在其他传记中予以暴露。如刘邦的无赖与残忍，主要体现于《项羽本纪》、《佞幸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等篇中。这样做，既忠于历史的真实，又不损害人物形象，表现出司马迁高超的艺术才华。

司马迁在注重以典型事件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有时也描写一些似乎远离主要事件的琐事，看似闲笔，实际对人物形象的丰满、人物个性的鲜明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少年时或不得志时的生活琐事，往往能表现人物的抱负、志趣和天才，预示着人物性格发展的方向。如《陈涉世家》中记载的陈涉“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的小故事，就写出了陈涉胸怀大志、不安于贫贱、自负而轻视别人的本质，揭示了他首难反秦，为王后忘旧情、杀同伴的思想基础。再如《留侯世家》中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中李斯叹鼠等琐屑小事，对于写历史或许没有必要，但对于塑造人物来说，却有助于形象的鲜明与丰满。有些篇章甚至全由一些生活琐事组成，小中见大，揭示重要的主题。如《万石君列传》，写万家一门没有别的能耐，仅靠“恭谨无与比”的小事就讨得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四代皇帝的欢喜，父子五人都官至二千石，石庆还当上了丞相，这就尖锐地触及了当时的官场重用什么问题，反

映出社会本质的某些侧面。

司马迁刻画人物，既不是平铺直叙地介绍，也不是静止地罗列人物的言行，而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和紧张的场面，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开始先渲染项羽的声威和刘邦的岌岌可危，揭示出矛盾的尖锐，而项伯的调和，暂时扫除了战争的阴云，于是刘邦谢罪，项羽留宴，矛盾似乎解决；范增“数目项王”，刘邦的处境骤变，然而“项王不应”，气氛稍微缓和；项庄舞剑，沛公命在顷刻，而“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惊险之际，樊哙闯入，异峰突起，人们的注意力转到樊哙身上，舞剑自动收场，情节也从高潮导向结局。逃宴、留谢，虽系尾声，但仍紧张曲折，“沛公起如厕”，想趁机溜走，又有“都尉陈平召沛公”，气氛又是一紧。客人散去，剩下了范增破玉斗、君臣不欢的余波。最后沛公“立诛曹无伤”，暗示斗争并未结束。整个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而司马迁却处理得井然有序，使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得以淋漓尽致的展露。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灌夫骂座、东朝廷辩，《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的场面，以及《吕太后本纪》中诛灭诸吕的情节等等，无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选择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写入《史记》，这体现着司马迁独特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多爱不忍，